

顾廷龙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刊(一)

论顾廷龙先生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王世伟

(上海图书馆 200031)

文 摘 文章从创办合众,存亡继绝;护书如命,积淀文化;编印书目,揭示馆藏;孤本不孤,化身千百;勤慎忠实,兢兢业业;以馆为家,服务读者;培养人才,奖掖后进;学术识见,图界指南等八个方面对顾廷龙先生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 顾廷龙 合众图书馆 图书馆史 图书馆事业

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号匍珍。1904年11月10日生于江苏苏州,1998年8月22日在北京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5岁。顾先生是著名的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自1932年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后,应洪业图书馆馆长之邀,留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开始投身于图书馆事业,并长期从事古籍版本学的研究与实践。在六十六年的图书馆工作生涯中,顾先生由北京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到征访搜集各类稿抄校本,从全国古籍联合目录的编制到主编《续修四库全书》,从影印珍本孤乘化身千百到抢救历史文献于废纸之中,从青年图书馆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到图书馆服务精神的培育,顾先生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1 创办合众,救亡存绝

在1939年春夏之交,叶景葵给当时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部主任的顾廷龙多次写信,希望他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在信中说:“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1]1939年5月23日,叶景葵在致顾廷龙的的信函中又提到:“馆名合众,因希望社会中坚众擎易举之意。”^[2]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合众图书馆的董事陈陶遗等曾于1946年1月24日向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其中也论及了合众图书馆创办的旨意:“窃(陶遗、景葵、元济)等当昔国军西移以后,每痛倭寇侵略之深,辄念典籍为文化所系,东南实荟萃之区,因谋国故之保存,用维民族之精神,

……拾遗补阙,为后来之徵。命名合众者,取众擎易举之义,各出所藏为创。”^[3]有鉴于此,顾先生于1939年夏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部主任之职,毅然南下到上海,当年7月17日到馆。在顾先生来上海前夕,叶景葵在致顾廷龙的信中曾提议让顾先生出任合众图书馆的总编纂和总务之首领^[4],顾先生来上海后,由董事会聘任为总干事。顾先生在到馆的第二天便提出了成竹在胸的《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在“空无一人,空无一物”的情况下^[5],具体承担起了创办和主持各项馆务的重任,成为合众图书馆实际工作的创办人与主持者。在“谋国故之保存,维民族之精神”办馆思想的指导下,顾先生在董事会的支持与帮助下,馆藏文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捐赠匡助,其中较著者有叶景葵、蒋抑卮、张元济、李宣龚、陈叔通、叶恭绰、胡朴安夫人、章仲和、冯翰飞、顾颉刚、毛彦文、盛宣怀后裔等。在几年中使合众图书馆的藏书达到十四万册。1948年8月,顾先生在《番禺叶氏遐庵藏书目录序》中述及创办合众图书馆的理念:“上海为通都大邑,尚乏完善之图书馆,宁非憾事。甚愿合各家之专藏以成一馆,合各专藏之馆以萃于一市,庶收分工合作之效,盖亦我合众命名之意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困难情况下,顾先生创办并主持的合众图书馆为保存祖国的历史文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以后的历史文献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奠定了历史文献的重要基础,成为现代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值得一书的学术图书馆和古籍图书馆。

2 护书如命,积淀文化

早在三十年代初,顾先生即助顾颉刚先生组织

《禹贡》学会,发刊《禹贡》月刊,编辑《西北边疆史地丛编》,创建历史地理之学。为收集有关文献,顾先生广事徵求,筹集资金,大有收获。之后,顾先生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工作,“搜索善本古籍,多有成就”。^[6]抗日战争胜利后,顾先生曾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从贵州大学图书馆将一批革命文献转移至上海,将其藏于图书馆的书架顶端。1949年以后,由中央调回北京,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1955年秋天,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大批废纸约二百担左右,上海市文化局根据浙江文物保管委员会的通知进行联系,了解其中线装书比较多,就组织人力开展抢救工作,顾先生也参加了这次抢救,前后化了11天时间,挑选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献。对于如何看待废纸,顾先生当时发表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在挑选的问题上,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取”、“舍”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大家的看法还有些不一致。我的看法是标准应当宽些,如果紧了很容易使许多历史文献失之交臂。

关于废纸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确实毫无用处的废纸,如:复本多、流通广、传本众的旧书,年代近而又同型同时的契券、账簿、教科书、学生作业簿等可作废纸处理。(二)可以供历史研究参考的,如这次搜集的八股文、账簿、万宝全书、阴阳卜筮等书,都可以从中得到经济、教育、风俗等的史料,这些史料决不是正史中找得到的。这一类书籍应当尽量保存。(三)很有价值的书,但曾被误认作无用而废弃的,如这次挑选出的《国史纪闻》、《三峡通志》、《严州府志》、《山水争奇》等。

因此,废纸内容包罗万象,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多吸收研究各种专史的人来参加,或提供意见,否则许多材料会因外行人认为无用而仍旧当作废纸处理的。^[7]

不仅如此,顾先生还从这次废纸抢救中联想到了许多文献保存的问题,因为他感到单从抢救废纸看,仍会使许多珍贵的资料受到损失。如要积极地进行宣传,重视图书文物的保存;民间零星旧杂志的保存;单本和纸片积聚并分门别类;将讣闻、小传、哀启进行汇编;有些无用的旧线装书可留作补书之用,如此等等。对于历史文献的征集,顾先生提出了十二大类型的范围:革命文献、档案、地方志、家谱、社团记载、个人记载、古代医书、账簿、迷信书、民间文艺、古典艺术、图片。顾先生的这种抢救征集文献的远见卓识与“起而行”的实践为上海图书馆的文化积

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让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增强了文献的保护意识。

对于文献的抢救,往往来自对文献价值的认识。如硃卷,就是旧时举子的试卷弥封后交替录生用朱笔重新誊写的卷子。考生用墨笔所写的试卷则称为墨卷。在硃卷中,有考生履历、有考生中式名次及考官的批语,还有考生的文章。顾先生认为:硃卷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其履历比官刻的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以及同年齿录等所载详细,不啻一部家谱的缩影。而硃卷是研究八股文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这类实物,人们还能形象地了解当时的考试形式、方法与考生的科场面貌;从试文与考官的评语、荐语及批语中,不仅可辨别清代取士的评判标准,更能窥视清代教育状况之一斑。在抗日战争合众图书馆发展期间,曾以重价购得海盐朱氏寿鑫斋所藏硃卷二千余册,后由吴县潘氏著砚楼捐赠一千余种。至后来发展到八千余种的规模。1992年,时值上海图书馆40周年之际,顾先生主持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将馆藏硃卷予以影印。顾先生为此“喜而不寐”。

凡遇破损文献,顾先生即及时请修补人员进行修复,以免遭废弃。如清戴震《声韵考》稿本,内中有清孔广森之签注。但此稿1973年由文物清理小组送来上海图书馆时,已霉烂粘连成饼状。顾先生即请修补人员修补完整,“否则必遭废弃矣”。^[8]

对于文献的珍视,顾先生还认为要对文献的内容和价值真正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将文献的保护贯彻到底。如对于一些前人的日记、手稿、尺牋,“余尝谓子孙之爱护先人手泽,多知其当然而知其所以然者为少,非出真知笃好,终归湮没。”^[9]

3 编印书目,揭示馆藏

顾先生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章珏先生的家属曾以所藏典籍寄存北平图书馆,顾先生于是为之编目,即著名的《章氏四当斋书目》。全书三卷,析为五册,燕京大学图书馆1938年刊印,所谓“有序有方,目录学之名著也”。^[10]这也成为数年之后叶景葵邀请顾先生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的触发因素。

在合众图书馆任职期间,顾先生又为叶揆初先生的藏书编目,成《杭州叶氏卷庵藏书目录》,著录古籍2878部,31567册,其中多名家手校本。又请潘景郑先生为张元济捐书编为《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类似书目先后编成的有十多种。

在上海图书馆任职期间,顾先生完成了其对学术文化最大贡献的两部古籍联合目录:《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而对于中国浩如烟海的丛书古籍而言,查检颇为不便。为迎接建国十周年,上海图书馆由顾先生议定以编制巨型古籍检索工具书《中国丛书综录》作为献礼。此工具书以上海图书馆所藏丛书为主,联合全国各大图书馆所藏丛书,共收录中国国家图书馆等41个大型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子目38891种,分为总目、子目分类目录、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三册,其中第一册总目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1962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该书问世后,被学界称为是“一部最有用、最便于检索的工具书。……出版以后,大受欢迎,《人民日报》称它是检查中国古籍的‘雷达’,意即凭此可以立即求到所需古籍之所在的一种仪器,可见其身价之高。”^[11]

中国各文化学术和出版机构收藏的中国古籍善本众多,但苦于没有一部书目,家底不清,既不便保护与抢救,也不便利用与研究。由于北京图书馆赵万里先生重病卧床,于是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重任就落在了顾先生的身上。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发出了“要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总目录编出来”的指示,1978年3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在南京召开会议布置总目编纂事宜,至1995年3月全书完稿,1998年3月全书印制完成,其间历时二十年之久。其中经部书前有顾先生题签:“一九八五年十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实际上经部线装本于1986年出版;精装本经部(全一册)于1989年10月出版,丛部(全一册)于1990年12月出版,史部(全二册)于1993年4月出版,子部(全二册)于1996年12月出版,集部(全三册)于1998年3月出版。其中丛部后附有冀淑英先生所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记》。全书共收录全国781个图书馆等文化机构所收藏的古籍善本6万种,约13万部。在顾先生逝世前,这部花费了他数十年心血的巨著终于全部杀青面世,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发展史上最具影响的联合目录和图书馆古籍整理的成果。近年来,先后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多赖是目有所参考取资,其于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及中华传统文化保存研究之贡献,可谓大矣。

4 孤本不孤,化身千百

孤本不孤,化身千百,是顾先生保存历史文献的一贯思想。1981年7月,顾先生在《张元济书札跋》中提到:“昔黄黎洲言,藏书难,藏久尤难。龙从事图

书资料之搜集保存工作有年,初亦有此同感,且谓保存固难,搜集实尤不易。既而思之,今日缩微照相之业日益发展,若随手采获,即付摄影,亦可化身千百,以垂久远。斯可解黎洲之惑矣!”1988年10月,他在谈到藏书问题时说:“作为一名图书馆馆员,在熟悉了馆藏之后,对藏书之珍护尤为亲切,管理方法亦多研索。窃谓今日之管理善本,重在重印,使其化身千百,代代相传,不至湮没。昔人所用之纸为手工制造,可以经久。尝见敦煌写经六朝用纸,至今千年后披展如新。凡古书之损毁,皆出于人为。”^[12]1989年8月,顾先生在为《宋人佚简》作序中又谓:“木板书之印数历来不多,非今日印数动辄千万者所可想象。因此希望出版界对现存古籍,择其稀见者为续命之谋,终使孤本不孤,秘本不秘,有利于学术研究,岂不善哉!”1996年,顾先生在北京北郊寓所多次谈到盛宣怀档案的整理,并提出要对盛档全部进行拍照复印,孤本不行。顾先生不仅是这样认为,在数十年的图书馆生涯中也是这样实践的。

在担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期间,顾先生主持《合众图书馆丛书》的辑印,均为孤本珍籍。由于经济困难,为节约印刷成本,顾先生手自抄写上版,一夜之间,抄写三千小楷,其对文献之爱护,其对保存传播文献之决心和毅力,令人赞叹。

在担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就先后主持影印了三十多种馆藏珍贵文献,或在馆进行石印,或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进行合作予以影印,如宋本《唐鉴》、《韵语阳秋》、《元包经传》、《钜宋广韵》、《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东观余论》、《杜荀鹤集》、《嘉祐集》、《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元本《农桑辑要》、《颜氏家训》、《文心雕龙》,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读史方輿纪要》,明写本《永乐大典》(郎字韵一册),清述古堂影宋抄本《集韵》等。如馆藏孤本宋舒州本《王文公文集》交付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当时胡道静先生正在所中任职,《王文公文集》即由胡先生担任执编。胡先生认为:“《王集》玻璃版在馆,唯顾馆长知之,又此集所收王安石佚文佚诗至多,更惟顾馆长了然。微馆长,殊不能有善本《王集》及内容如此丰富者出版呈现于世也。”^[13]当顾先生从胡先生普查中国古农书中得知,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有孤本古农书明抄本《分门琐碎录》、《稼圃辑》及清刊本《浦柳农咨》,即举付馆办小印刷厂各影印数百册分赠有关部门,使这些孤本化身千百。

即使在顾先生去世前夕,仍在积极提倡影印古

籍。1998年4月,他在《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北齐书跋》中提到:“日前在厂肆获睹百衲本《史记》,不同时期不同版式,洋洋大观,希望好古之士谋以影印流传,供版本学之研究。”

5 勤慎忠实,兢兢业业

在66年的图书馆生涯中,顾先生始终勤慎忠实,兢兢业业。在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二十年中,顾先生以耄耋之年,不辞辛劳,西去南京、安徽、成都,南下南昌、广州,进行调查、研讨、鉴定、著录、验收、培训等工作。对于书目的复审、定稿、付印等项事宜,先生也亲自协调布置,往来奔走于各地。先生对于工作一丝不苟之精神,为图书馆界所共仰。

1987年秋,顾先生到山东省图书馆访问,当时馆中采编部、特藏部以及馆领导都久仰顾先生的书艺,不愿放弃难得的机会,于是大家都手持宣纸尺页,欲求顾先生的墨宝。当时顾先生感到人数太多,无法当场书写,请开列名单,答应返沪后有以报命。人们可能以为仅是应付,但令人出乎预料的是,顾先生返沪不到一个月,就按开列的名单,各自书尺页一幅,寄至山东省图书馆。得此墨宝之馆员无不喜出望外,至今谈起,对顾先生的诚信待人犹感慨不已。

尽管馆务繁忙,但顾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晨抄夕纂,无间寒暑,每有知见,辄随手题记。顾诵芬先生在回忆其父亲时谈到顾先生勤慎忠实、兢兢业业的品质:“父亲70年来一直勤奋做学问,他亲自作了大量古籍校勘过录工作,他以工整楷书密行细字写了大量的眉批和注录。他在文革以前从来没有11点以前睡过觉。父亲一生对工作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别人托题的字从来没有写一次成的,总是改了再改直到他自己认为拿得出去才罢。……他在学术上虚怀若谷,为了保证文章的质量,写成后一定要请有关同行先看,甚至找比他年轻很多的同志看,对人家提的合理意见他都照改。”^[14]

顾先生曾告诫他的学生,年轻时要多读书,不要急于成名。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如1936年元旦,他在《古匋文畚录自序》中将自己的读书居处名之为“晚成堂”。1982年8月,他在《题吴焘木水墨花卉册》中又将自己的读书居处名之为“晚学轩”。

6 以馆为家,服务读者

顾先生虽为大学者,但在数十年的图书馆工作中,始终以读者为本,全心全意为每位来馆的读者服务。胡道静先生在述及当年顾先生对他的帮助时,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时余任抗战工作在内地,至

胜利返沪,与学长重聚言欢,始常在合众图书馆阅书,余撰《梦溪笔谈校证》,得力于学长及图书馆藏书为多,乃余所深感也。”^[15]1939年7月,顾先生到合众图书馆任职后,在其所拟《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中提到了“专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的服务精神。

学者冯其庸先生在为纪念上海图书馆成立五十周年所写的《我的第一本书》中谈到了顾先生当年在合众图书馆的服务精神:“我见了顾廷龙先生以后,先生十分照顾,特给我留一个专柜,每天借书不用再办手续,所用的书人在专柜里,第二天自己取用,这样节省了很多时间。这时我正在写《蒋鹿潭年谱稿》……这样,我以合众图书馆作为我的基地,在那里开始写作,经过半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初稿。中旬我还遇到车祸,撞伤了腿,有较长一段时间不能去合众图书馆,顾先生还托人来问,为什么不去看书?知道我受伤以后,还嘱咐我好好养病,书柜仍保留着。等我病愈以后,终于在那里完成了此书的初稿。之后,我又清抄了一遍。文革中,我的清抄本丢失了,而我在合众图书馆的初稿本侥幸还保留着,大部分资料还保存着,所以我又下决心依据初稿,重新撰写此书。”^[16]从冯先生回忆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图书馆员为读者所提供的精致服务。这种为读者设立专架的情景,并不仅仅出现在冯其庸先生一个读者身上。同时,有不少读者写信咨询,顾先生也一一作答,如朱启钤、陈钟凡、陈寅恪、陈垣、邓之诚、聂崇岐、王重民、向达等。王绍曾先生评价说:“‘合众’为广大读者服务,不论亲疏,无间远近,此皆先生有以致之。”^[17]在数十年的图书馆工作中,顾先生的这种服务理念矢志不移,这种大公无私的图书馆服务精神,感染影响教育了一代图书馆人。

7 培养人才,奖掖后进

顾先生曾谓,凡执事者务以培养接班人为唯一任务,如学者有与执事人意见相左时,仍当克制忍耐,切勿扰其中心工作。

1981年,顾先生撰写了《整理出版古籍小议》一文,谈了对于整理出版古籍的十点意见,其中第三点就是“培训专研人员”。顾先生认为:“大学文科应设古典文献学系。创设研究所,将素有研究者组织起来。大学生或研究生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的基本功,将来各专一经,分别研究。凡古籍专业人员,能通外语固好;如对外语没有学过或学得不够深的,大学生似可许其免修,加深其古汉语的研读。青年中有自学古书而有一定门径或基

础,能否破格招为大学生或研究生,广开才路。”这些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思想和措施,不仅在后来的整理工作中得到了落实,即使在今天看来,对于图书馆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依然有着指导作用。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顾先生不辞馆务繁忙,先后接受聘请,担任了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了国内外近十名研究生。为图书馆事业留下了理书、护书的种子。不仅如此,在图书馆工作的数十年中,特别是上海图书馆建立后,在工作中,顾先生也不断指导培养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的年轻同志,有些同志离开上海图书馆后,也不断得到顾先生的教诲和鼓励,从而使他们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一些同志现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王绍曾先生1979年发表《试论张元济先生对我国文化事业及目录学的贡献》一文后,将此文寄予顾先生教正,顾先生自外地返沪后即回信,奖勉有加,并将此稿转请张树年、丁英桂先生校订,后推荐给新西兰华裔学者叶宋曼英女士。同时,又鼓励王绍曾先生在论文的基础上扩写为张元济的传记,用以表彰张元济对近代出版事业及整理古籍的丰功伟绩。书稿完成后,顾先生正忙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事宜,但对《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的书稿,还是一丝不苟地进行了审阅。对于王绍曾先生所编《古籍目录版本校勘文选》,顾先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增改意见。使王绍曾先生感到“先生思虑缜密,关爱后生,可谓无微不至。”^[18]

8 学术识见,图界指南

顾先生于古籍目录学多有研究,自《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十六卷发端之后,早年就有目录学研究的抱负。先生尝谓:“夙有纂辑《目录学》一书之志,拟分三编,曰《流略》、曰《图录》、曰《校讎》,断代为章,复各析以时地公私之作,俾有系统可寻,条理可睹。”^[19]1941年,顾先生与潘景郑先生合编之《明代版本图录》就是其计划中的目录学中图录的一部分,而此图录也为研究明代版本提供了翔实的文献史料。胡道静先生谓:“学长(指顾先生)又有特殊见解,以为《四库存目》必须作版本标注。”^[20]

对于古籍版本,顾先生认为“非旧本尽善也”。“旧本之优劣,必校勘而后可知,非旧本尽善也,或有佳槧,历年既久,沧桑屡经,流传遂少,自甚可贵。至若当时坊本,雕板既劣,校字未精,而善本渐多,乃为淘汰之未尽者,传至今日,虽同罕觐,事实霄壤,倘执迷于旧本为必善,不加审择,不亦真乎!”^[21]顾先生

又认为,古籍版本中,或有祖本为一,印本有先后的例子。如《集韵》,清段玉裁所据校之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入藏于今宁波之天一阁,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今已归之上海图书馆。“今就毛抄与钱抄言之,两本版式行款,完全相同,应为从同一底本所出,但钱抄字划不完,缺漏空白,而毛抄则否,何也?窃谓缺字缺划,审系原雕板片之漫漶,非印本纸张之残损。毛抄已经重修,所以不缺不残。段校云:‘但其版心每叶皆云某人重刊,某人重开,某人重刁,则亦非最初版矣。’谛审钱本缺字,及残存笔划,以意度之,钱本尚出于修补以前之印本。……据此,可知祖本则一,印本有先后耳。”^[22]

对于古籍校勘学,顾先生在1988年3月20日写给王绍曾先生的信中谓:“近读古籍整理校勘(全称已记不起)第二期中有一文极言校勘不能择善而从,甚是甚是!择优而从,伸缩性太大。况现代学者与古之学者所见差距尤大,岂能一言为定,没有作过校勘工作者,他不理解,真所谓夏虫不可与语冰。思误一适,岂可与外行道哉!”这种校勘学的识见,对于今天图书馆的古籍整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于文字学,顾先生颇有研究。早在他所撰写的燕京大学研究生论文《说文废字废义考序》一文中就提出:“据《说文》以溯金文、甲骨文,是为阶梯。”并提出了研究《说文》的方法:“窃拟其途有三:一则以《说文》中连字,即互训者,统为考录,俾知全书之单字若干,单字偏旁与金文、甲骨文之缔造,其关系若何,或可比见。二则考《说文》中确为汉代之字,及一字而孳乳义近之数字者,分别录著,则余者或可谓较早之文字矣。三则《说文》之字至今日有不用者甚多,就其不用者一一考辨,可见《说文》之中,或有真古文字在也。”对于文献整理中的“隶古定”问题,顾先生认为:隶古定就是用正书按科斗古文笔画写定的本子。正书始于东汉,魏、晋以后普遍使用,所以隶古定不会始于西汉。唐写本多异体字是一普遍现象。这些异体字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寻,我从阅读敦煌写本记得一二。唐写俗字,可以偏旁区别;唐写本中别体字好将两旁写作对称。这些俗字和别体不是用楷(隶书)按照古文笔画写的,因此是异体字,不是隶古定字。在《尚书文字合编前言》中,顾先生对先秦《尚书》的面貌、西汉的今古文、东汉的科斗古文、东晋的隶古定、唐代的今字和异体字、五代的科斗古文和宋代的隶古定等分别进行了考证。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言:“经学中今古文问题以《尚书》为最复杂,加以字体讹者弥多,遂至纷乱而不可理董。”^[23]顾

先生寻求经学字体的演变,对于古籍整理特别是先秦文献的整理中的今古文字问题,理清了脉络,对于纷繁复杂的字体传说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总结。

对于先生主持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续修四库全书》,顾先生在1994年8月1日写给王绍曾的信中说到了三方面可以节省时间的地方:“窃谓现在修,比乾隆时修,时间可省。乾隆时篡改时间所费很大。我曾见四库底本《三朝北盟汇编》,全书改动很大,仿佛改学生作文,在四库正本中已看不到删改之迹。但此书光绪间许涵度刻于成都,将原文用夹注刻出。(古籍似已影印)此其一。前年张连生送我影印文渊阁本《元诗选》,曾取家刻校了一、二卷,改动之句亦不少。尝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看到一本诗集,是明人的,亦经馆臣修改。从这三种书情况,可见改书工作量很大。此其二。誊录正本,都是正楷,相传有的人,只抄书口几行,乾隆发现了重抄。此其三。现在续修,一不要改,二不要抄,时间要省多了。至于撰提要问题,看了前东方文化委员会的总结,亦不甚难。”^[24]这些都是经验积累的识见,对于古籍整理工作的计划、组织等都具有指导的意义。

对于图书馆学,顾先生也或有述及。如对研究图书馆与普通图书馆之不同,顾先生自有他独到的见解:“余从事图书馆工作五十余年,深感研究图书馆与普通图书馆性质不同,管理亦不同,研究图书馆之管理人员不能不熟悉馆藏,凭一张卡片难能尽达,亦非电脑所全能反映。若熟悉馆藏,则由此及彼,由表及里。”^[25]

王绍曾先生曾谓:“学者自立于天地间,以有涯之生,获千古景仰者,咸在道德文章二事。前辈顾起潜先生可谓兼有两美而无遗憾矣。”^[26]今年适逢顾先生百年诞辰,撰此短文聊申介祝,藉志景仰云尔。然亦不足以表扬先生于图书馆事业贡献于万一,先

生的图书馆精神、先生对图书馆学术之贡献,学生当另外撰文以表扬之。

注释

- 1 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便笺)(三十四).见:历史文献(第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4:31
- 2 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便笺)(三十七).见:历史文献(第1辑):32
- 3 陈陶遗等.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上海图书馆永久档案, #1
- 4 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便笺)(三十五、三十六).见:历史文献(第1辑):32
- 5 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便笺)(四十).见:历史文献(第1辑):33
- 6,10,13,15,20 顾廷龙文集《胡道静序.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7
- 7 顾廷龙.我在废纸中抢救历史文献的一点体会.见:顾廷龙文集:638
- 8 顾廷龙.声韵考跋.见:顾廷龙文集:40
- 9 顾廷龙.宝迂阁日记跋.见:顾廷龙文集:68
- 11 胡道静.顾老与古籍版本目录学.见: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8:23
- 12 顾廷龙.天一阁丛谈序.见:顾廷龙文集:95
- 14 顾诵芬.父亲永生.见: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3
- 16,18,19 冯其庸.我的第一本书.上海图书馆编.见:我与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7
- 17,24,26 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
- 21 顾廷龙.春秋繁露跋.见:顾廷龙文集:21
- 22 顾廷龙.影宋抄本集韵跋.见:顾廷龙文集:38
- 23 见顾廷龙.尚书文字全编前言.见:顾廷龙文集:3
- 25 天一阁丛谈序.见:顾廷龙文集:94~95

王世伟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用户研究与服务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图书馆学会秘书长。

